

● 元典文化丛书 ●

史家绝唱

《史记》与中国文化

邓鸿光 著



李振宏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史家绝唱

《史记》与中国文化

邓鸿光 著 ● 河南大学出版社

元典文化丛书

史家绝唱

SHIJIA JUECHANG

——《史记》与中国文化

邓鸿光 著

责任编辑 汪维真

责任校对 王学春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15千字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 精装:25.00元
平装:20.00元

ISBN 7-81041-506-9/K·217

序

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之“文化元典”^①。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

^① 关于“文化元典”的界说,详见拙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

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家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入“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至在两千余年间,元典常释常新。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

“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我从事元典研究多有年所,然困惑处不少,亟望友朋切磋。令人高兴的是,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元典文化丛书”,这使我顿觉良师益友在侧,其欢欣鼓舞自不待言。该丛书将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批文化元典逐部加以诠释,并阐扬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影响,从而揭示今人精神之来源,民族文化之来龙去脉。这套丛书旨趣高远,而行文切实,为一雅俗共赏佳品。主事者今嘱余为之序,特撰上述,以谢盛意,并藉此就教于丛书作者和读者诸君。

冯天瑜

1994年8月21日于武昌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年代。在这段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转型过程中,中国历史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经历着深刻的变迁,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各种意识形态、哲学观念、历史意识、宗教神学、文化科学等,也都以成熟的形态凝聚、荟萃,涌现出一批文化元典,从而为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义域广阔的开放性基础。这些文化元典,诸如《诗》、《书》、《易》、《礼》、《春秋》、《论语》、《老子》等,包含了后世中华文化的各种文化因子,历史地决定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及其文化性质和特征。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成为今天人们所熟悉的面貌,中国国民性格之所以显示出大异于西方民族的特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以独特的历史道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是受惠于这批文化元典的历史奠基。

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必然要求以文化的变革为先导,为

前提,同时也作为最终巩固经济、政治变革成果的牢固根基。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变革,都不可能是对先前文化传统的革除和清洗,而恰恰相反,民族文化的每一次更新,都是原有文化传统精髓在更高层次上的发扬和转换,是将原有文化传统在其开端时已蕴涵着的文化义蕴在新形势下重新发现,重新唤起,并赋之以新的生命活力。唯有如此,文化才有更新,才有发展;唯有如此,文化也才有绵延不断的统绪,也才能为全体民族成员认同和承袭。大概正因为如此,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清理,从80年代以来,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选题。

研究和清理民族传统文化,自然应将目光投向奠定了民族传统文化基础的文化元典,它们之中包含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这一点,似乎不少文化学者都注意到了,因此,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关于文化元典的通俗读本,白话、译作蔚为一时之盛。然而,民族文化的清理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工作,通俗性的讲解和翻译,只是一个最必要的基础;我们还需要去深入挖掘诸文化元典的内在义蕴,特别是这些经典著作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塑造,怎样起到了一种奠基性、支配性的作用,也都需要理个清楚;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来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作出清醒的考察和历史的批判。但这种从历史角度考察文化元典的作用,进行文化精神寻根探源的艰巨工作,似乎还没有人做过。文化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我们选择了编撰“元典文化丛书”这个课题,并为丛书确定了这样的宗旨:揭示文化元典著作的内在精神,并以主要篇幅阐述这些元典著作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性格的全方

位历史影响,使广大读者能够在一本书中了解一种元典论著的深刻内涵,并将今天的民族精神与之联系起来,知道今人精神之来源,弄清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文化元典的历史价值,寻找文化创新的契合点。

“文化元典”是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创制的概念。“元典”包含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及大典、善典、宝典等义蕴,亦即圣典、经典之义。文化元典之中应是蕴藏了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样的典籍并不很多。然而,从民族文化整体去考察,有蕴涵其整体精神的元典之作,如传统的“五经”、“四书”即是;而就某一种文化领域来说,又有该领域的创始之作,如兵学有宝典《孙子兵法》,医学有首创之作《黄帝内经》,神话之源《山海经》,算学之宗《九章算术》,史学的范型《史记》等等。这种某一文化领域的创始作,自然也应填于元典之列。这样,我们这套丛书初选了部分文化元典,分别考察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以期从一个新的基点上重新认识古代典籍的文化价值。

揭示文化元典的深刻内涵,并着重阐述其全方位的历史影响,并非易事,要有较深的研究工夫;再加上要面对普通读者,又需有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能力。因此,这套丛书的编写,对著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应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道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一概略的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应对以往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尽可能全面地认识元典著作的整体性、全方位的历史价值,并具备驾驭这些成果及将其融为一体的能力;应具备将学术成果准确而不失生动活泼地进行阐述的语言文字能力。然而,在具体写作中,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每个作者又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

自己著作的立意、结构和行文,进行创造性的构思和安排。因此,丛书的每一本著作,既是丛书整体中的一分子,又不失每位作者个人著作之特色。

本丛书的撰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工作。但为了使它能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我们对作者提出了思辨性与通俗性、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统一的要求;并力求在编写体例上、文风上照顾普通读者的需求,对一些艰涩的引文尽可能加以译述,或直接译为白话文加以征引。

现在,这套丛书开始出版了。作为一个文化人,当自身的使命感开始化作现实的时候,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然而,我不能不说,这套丛书所以能面世,真正对它做出了贡献的是每一位作者,而为其付出了代价的则是出版者。在当前到处都在谈论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河南大学出版社欣然承担这套很可能要赔钱的大型丛书的出版工作,表现了他们博大的胸怀和眼光,以及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65年前,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风雨如晦的年代,然而,却处于一个历史、文化的转型期,一个社会全方位变革的时期,清理古代文化,弄清未来的方向,也是一个极为迫切的任务,我们仍需要为祖国新文化的建设鸡鸣不已。愿我们的“元典文化丛书”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更新尽一点绵薄之力。

李振宏

1994年9月11日

目 录

序	冯天瑜(1)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李振宏(5)
一 太史公司马迁	(1)
1. 时代与家世	(1)
2. 壮游与入仕	(10)
3. 忍辱与著史	(21)
二 《史记》的结构与内容	(28)
1.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28)
(1) 纪传体史书的创立	(29)
(2) 十二本纪	(32)
(3) 十表	(36)
(4) 八书	(41)
(5) 三十世家	(45)
(6) 七十列传	(48)
2. 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真实记录	(53)
(1) 三千年历史面貌	(54)

(2) 多民族国家画卷	(55)
(3) 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	(59)
三 《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	(66)
1. 继史学传统	(66)
2. 明《春秋》大义	(79)
3. “述往事,思来者”	(83)
四 《史记》的历史哲学	(89)
1. “究天人之际”	(89)
(1) “天道”与“人道”	(90)
(2) “究天人之际”	(94)
2. “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	(99)
(1) “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	(99)
(2) “强弱之势”与“士之偶合”	(104)
(3) “其义或成或不成”与“立意较然”	(107)
3. “通古今之变”	(111)
(1) 穷、变、通、久的思想传统	(112)
(2) “观事变”	(115)
(3) “极人变”	(118)
(4) “略协古今之变”	(122)
五 《史记》提供的历史经验	(127)
1.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127)
2. “逆取”与“顺守”	(132)
3. “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136)

六 《史记》与中国史学	(140)
1. 正史的开山	(140)
2. 开通史家风	(145)
3. 树实录范例	(149)
七 《史记》与中国文学	(153)
1. 传记文学的先驱	(153)
2. 对后世小说与戏剧创作的影响	(162)
3. 关于文学批评	(166)
八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173)
1. 奠定了古代史家的史学自觉精神	(173)
2. 确立了重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思想	(185)
3. 第一次表达了强烈的民族凝聚意识	(191)
附录一 《史记》选译	(199)
五帝本纪(199) 秦始皇本纪(202) 高祖本纪(218) 三 代世表(232) 十二诸侯年表(233) 六国年表(235) 秦 楚之际月表(238) 礼书(239) 乐书(242) 河渠书(243) 平准书(244) 陈涉世家(246) 商君列传(255) 太史 公自序(266)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276)
后记	(279)

一 太史公司马迁

阅读《史记》这部历史巨著，犹如徜徉于历史长河之中。在这里，能聆听司马迁对历史的述说，也能欣赏到他对历史气势恢宏、卓越精深的描绘。

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也是卓越的文学家、杰出的思想家。他用热情、心血与智慧，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传世不朽的文化遗产——《史记》，从而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谱写了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篇章。

1. 时代与家世

是时代造就了司马迁和他的辉煌的史学事业。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正是这个时代所具有的特殊的环境与条件，造就了史家司马迁。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政治大一统的时代。首创中华民族

大一统业绩的是秦始皇。秦始皇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兼并了六国,从而结束了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的局面,在中国建立起了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由于秦朝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在陈胜、吴广率领的农民起义的风暴中,秦朝二世而亡。刘邦建立汉朝,但当时统一基础并不稳固。刘邦在楚汉战争之后,处心积虑,先后铲除了异姓诸侯王,代之以同姓诸侯王。高祖死后,诸吕专权,而同姓诸侯王也使刘氏王朝的统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吕后死后,陈平、周勃等西汉老臣为了挽救汉王朝,合谋诛灭了外戚诸吕。文帝时,同姓王割据势力迅速扩张,日渐强大,以至自置官吏,自征赋税。吴王刘濞更是不断扩充实力,伺机谋叛。景帝谋臣晁错,看到当时的危险形势,向景帝提出《削藩策》。然而,各诸侯王坚决反对“削藩”,他们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生了吴楚七国叛乱。七国叛乱平定之后,西汉中央集权统治得到了有力的巩固。汉武帝继景帝“削藩”之后,接受并颁布了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进一步分散和削弱了诸侯的势力。另外,汉武帝将地方豪强势力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以便严加防范。从刘邦开始,至文、景、武帝,先后用了几十年的时间,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削弱并铲除地方割据势力,终于在汉武帝时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实现了大汉帝国的空前统一。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也是经济上空前繁荣的时代。西汉初年,由于秦末以来连年战乱,社会经济极度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面对极度荒凉残破的社会现实,西汉初期的统治者,从刘邦、惠帝、吕后,到文帝、景帝,都十分注意吸取秦亡教训,实行“轻徭

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刘邦曾宣布减轻徭役,并把田租从原来的“十税一”减为“十五税一”,即征取收获量的1/15。他还宣布,凡因饥饿卖身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普通百姓)。到文帝、景帝时,更加强调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曾宣布免除12年的田租,减征口赋、徭役,还宣布禁止残害身体的肉刑。景帝把“三十税一”的田租作为定制。这一系列扶植和保护农业生产的措施,促使汉朝的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了汉武帝初年,社会经济已达至空前的繁荣。“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俟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与此同时,商业也繁荣起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商富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文化的复兴与发展,是司马迁生活时代的又一重要特征。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从汉朝初年就开始了。刘邦曾“命萧何定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汉书·高帝纪下》);汉惠帝时“除挟书之律”,使“天下众书往往颇出”;《汉书·楚元王传》文帝废诽谤之法,放松了对思想的统治,还派晁错向伏生学习《尚书》;景帝时设《诗》博士、《春秋》博士……汉初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及其所采取的有利于文化发展的各种措施,为武帝时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相当长期的准备和积累,更需要一

个宽松与开放的思想理论氛围。汉初统治者信奉黄老之学,采取“无为而治”,较之秦王朝焚书坑儒的严酷思想统治,无疑给文化思想领域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气,同时也为后来文化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黄老之学作为汉初的指导思想,对于革除秦朝重赋暴政、采取轻徭薄赋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恢复和发展汉初的社会经济,取得了积极有效的成果。至武帝统治的全盛时期,黄老的“无为”思想,已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巨大变化的要求,因此,极力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帝,就不得不在指导思想上改弦易辙。在诸子百家中,汉武帝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在这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不过应该说明的是,汉武帝时期是以儒学为主,博采百家之长为其所用的。所以,百家之言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正是因为思想文化领域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自由,因而文化的复兴与繁荣才成为可能。

由此看来,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是汉朝政治空前统一、经济空前繁荣、文化空前发展的时期。司马迁与他的《史记》便诞生于这辉煌的时代。

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学术界颇多争论,其中有两种说法最有影响,一是主张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一是主张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这两说都是从《史记·太史公自序》的《集解》、《索隐》、《正义》这三家注中推算出来的。本书采取了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史记解题及读法》、张鹏一《太史公年谱》、郑鹤声《司马迁年谱》、日本泷川氏《史记会注考证》、朱东润《史记考索》等书